



智慧宝鉴

中華

大方略全书

政经

大唐威临天下 具在君臣合心
至如用贤纳谏 垂代立教和规
安邦利国盛况 堪为后世之表



【唐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序 (1)

君道 (2)

- ◇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
- ◇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……
- ◇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
- ◇故人君兼听纳下，则贵臣不得壅蔽，而下情必得上通也
- ◇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

政体 (10)

- ◇木心不正，则脉理皆邪，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，非良弓也
- ◇古之帝王为政，皆志尚清静，以百姓之心为心
- ◇天下稍安，尤须兢慎，若便骄逸，必至丧败
- ◇自古失国之主，皆为居安忘危，处治忘乱，所以不能长久
- ◇凡大事皆起于小事，小事不论，大事又将不可救，社稷倾危，莫不由此

任贤 (21)

- ◇国家一朝忽然没了良相，就似失去双手一样
- ◇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

- ◇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，然而不得者，只为不闻己过，或闻而不能改故也
- ◇利主之败，自为已功，以邀富贵，是吾所耻

求谏 (34)

- ◇人欲自照，必须明镜；主欲知过，必藉忠臣
- ◇惟君臣相遇，有同鱼水，则海内可安
- ◇明主思短而益善，暗主护短而永愚
- ◇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，喜则滥赏无功，怒则滥杀无罪。是以天下丧乱，莫不由此
- ◇懦弱之人，怀忠直而不能言；疏远之人，恐不信而不得言；怀禄之人，虑不便身而不敢言
- ◇属文之士，伎巧之徒，皆自谓己长，他人不及

纳谏 (41)

- ◇天下不可以力胜，神祇不可以亲恃
- ◇阿房成，秦人散；章华就，楚众离；乾元毕工，隋人解体
- ◇宁济苍生，应须以欲从人，不可以人从欲
- ◇人臣之对帝王，多顺从而不逆，甘言以取容
- ◇夫人久相与处，自然染习

君臣鉴戒 (49)

- ◇君臣本同治乱，共安危，若主纳忠谏，臣进直言，斯故君臣合契，古来所重
- ◇为善者福祚延长，为恶者降年不永
- ◇首虽尊高，必资手足以成体；君虽明哲，必藉股肱以致治
- ◇以石投水，千载一合，以水投石，无时不有
- ◇委大臣以大体，责小臣以小事，为国之常也，为治之道也
- ◇上之不信于下，必以为下无可信矣。若必下无可信，则上亦有可疑矣

择官 (59)

- ◇致治之本，惟在于审。量才授职，务省官员
- ◇若得其善者，虽少亦足矣；其不善者，纵多亦奚为
- ◇致安之本，惟在得人
- ◇用得正人，为善者皆劝；误用恶人，不善者竞进。赏当其劳，无功者自退；罚当其罪，为恶者戒惧
- ◇选众授能，非才莫举，天工人代，焉可妄加

封建 (65)

- ◇经国庇民，王者之常制；尊主安上，人情之大方
- ◇祚之长短，必在于天时，政或兴衰，有关于人事
- ◇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，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

太子诸王定分 (74)

- ◇贫不学俭，富不学奢
- ◇不能明立定分，遂使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则佞巧之徒承机而动，私恩害公，惑志乱国
- ◇惟忠惟孝，因而奖之道德齐礼，乃为良器

尊敬师傅 (77)

- ◇夫不学，则不明古道，而能政致太平者，未之有也
- ◇上智之人，自无所染，但中智之人无恒，从教而变
- ◇人之善恶，诚由近习

教戒太子诸王 (83)

- ◇凡稼穡艰难，皆出人力，不夺其时，常有此饭
- ◇凡为藩为翰，有国有家者，其兴也必由于积善，其亡也皆在于积恶
- ◇见善思齐，足以扬名不朽；闻恶能改，庶得免乎大过

- ◇父之爱子，人之常情，非待教训而知也
- ◇得一善人，部内苏息；遇一不善人，阖州劳弊

规谏太子 (90)

- ◇取之于正人，鉴之于灵镜。量其器能，审其检行。必宜度机而分职，不可违方以从政
- ◇直言正谏，以忠信而获罪；贾官鬻狱，以货贿而见亲
- ◇遇大道行而两仪泰，喜元良会而万国贞
- ◇自礼贤于秋实，足归道于春卿。芳年淑景，时和气清
- ◇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，苟违天道，人神同弃

仁义 (100)

- ◇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，国祚延长，任法御人者，虽救弊于一时，败亡亦促
- ◇知人无常俗，但政有治乱耳
- ◇林深则鸟栖，水广则鱼游，仁义积则物自归之
- ◇人皆知畏避灾害，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

序

吴兢

有唐良相，曰侍中安阳公、中书令河东公，以时逢圣明，位居宰辅，寅亮帝道，弼谐王政，恐一物之乖所，虑四维之不张，每克已励精，缅怀故实，未尝有乏。太宗时，政化良足可观，振古而来，未之有也。至于垂世立教之美，典谟谏奏之词，可以弘阐大猷，增崇至道者，爰命不才，备加甄录，体制大略，咸发成规。于是缀集所闻，参详旧史，撮其指要，举其宏纲，词兼质文，义在惩劝，人伦之纪备矣，军国之政存焉。凡一帙一十卷，合四十篇，名曰《贞观政要》。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，择善而从，则可久之业益彰矣，可大之功尤著矣，岂必假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而已哉！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。

【译文】

有大唐朝贤相待，中安阳公源乾曜、中书令河东公张嘉正二位大人，以为时逢圣明的君主，得以位居宰相之职，宣扬帝王之道，辅佐君王朝政，为自己的天职。他们恐怕有一点闪失，忧虑忠孝仁义之道不能推广，经常检讨自己，以图精进。他们缅怀历史的名人事迹，从来不肯懈怠。一致认为：太宗皇帝在位时的政策教化，十分值得借鉴，是亘古以来所没有的宝贵经验。至于当时垂世立教的美政，典谟谏议的词章，凡可以发挥弘扬大道者，凡可以增益崇奉至德者，二位宰相都让我这个识见寡陋之人一一加以拣选抄录。其体制大略，均发自成规，不敢随意改纂。于是，我便采拾搜集以前的所见所闻，再以旧有史书相印证、相参照，筛选其精华，明确其大纲，行文质朴而稍具文彩，主旨在于垂诫于未来。所收文辞，人伦纲纪皆在其中，军国要略无所缺漏。共一匣十卷，合计四十篇，题其名为《贞观政要》。此书编成，只望有国有家者因此而能找到前进的榜样与目标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那么，本来长久的帝王事业可以更加光辉灿烂，本来巨大的功勋可以更为广播四海，哪里非得要言必称尧舜、事必效汤武呢？

其篇目次第就开列于下。

君道

【原文】

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治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，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悦声色，所欲既多，所损亦大，既妨政事，又扰生民。且复出一非理之言，万姓为之解体，怨讟既作，离叛亦兴。朕每思此，不敢纵逸。”谏议大夫魏徵对曰：“古者圣哲之主，皆亦近取诸身，故能远体诸物。昔楚聘詹何，问其治国之要，詹何对以修身之术。楚王又问治国何如，詹何曰：‘未闻身治而国乱者。’陛下所明，实同古义。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公元六二七~六四九年初年，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：“作为君王的基本点，必须首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。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，就如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填塞肚子，肚子虽然饱了，人却死了。如果想安定天下，必须首先使自身行为端正。世上从来没有身子正而影子歪，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混乱的事。我常常想：伤害君王之身的不在外物，大都由于各种不良的嗜好和欲望所造成的祸患。假若过度爱好佳肴美味，沉溺于歌舞美女，那么所想得到的多了，所损伤的也就大了。既妨害了国家政事，又侵扰了全国百姓。还有，帝王说出一句非礼的话，民众们就会散心；怨恨诽谤一旦产生，叛离之事也就会接踵而来。我每想到这些，就不敢放纵嗜欲去追求享受。”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：“古代圣明的君主，大多是就近修养自己，所以能够远远地体察到其它事物。当年楚庄王礼请贤士詹何，向他询问治国的要领。詹何就拿如何修养身心来作答，楚庄王又问他治国的要领到底是什么，詹何说：‘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。’陛下所懂得的，实在符合古代的道理。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魏徵曰：“何谓为明君暗君？”徵曰：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蕘。’昔唐、虞之理，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。是以圣无不照，故共、鲧之徒，不能塞也；靖言庸回，不能惑也。秦二世则隐藏其身，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，及天下溃叛，不得闻也。梁武帝偏信朱异，而侯景举兵向阙，竟不得知也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而诸贼攻城剽邑，亦不得知也。是故人君兼听纳下，则贵臣不得壅蔽，而下情必得上通也。”太宗甚善其言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。太宗问魏徵说：“什么叫明君？什么是暗君？”魏徵说：“一个君主，他之所以能明达，是因为能兼听多方面的意见，把握多方面的情况；国君之所以昏庸，是因为他偏听偏信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先辈有这样的话，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。’古代尧、舜的时候，打开四方之门来接纳八方人士，开通四方视听来了解天下事理，所以能够做到圣明的目光无所不照察，因此共工、鲧这类人，不能蒙蔽他；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，也不能迷惑他。秦二世胡亥把自己深深地隐藏于深宫之中，捐弃隔离所有自己不亲近的人士而偏信于权奸赵高，及至天下已经崩溃离叛，他还一点信息都不知道呢！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话，重用侯景。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，梁武帝竟然还不知道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话，各路起义军攻取城池、抢掠乡邑，他也不知道。这样看来，人君要兼听，要容纳臣下的不同意见。那样，亲贵宠幸的臣子也就不能堵塞耳目、蒙蔽真情，而下情也就能够上达了。”太宗十分赞赏魏徵的这番议论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帝王之业，草创与守成孰难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：“天地草昧。群雄竞起，攻破乃降，战胜乃克。由此言之，草创为难。”魏徵对曰：“帝王之起，必承衰乱，覆彼昏狡，百姓乐推，叫海归命，天授人与，乃不为难。然既得之后，志趣骄逸，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，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，国之衰弊，恒由此起。以斯而言，守成则难。”太宗曰：“玄龄昔从我定天下，备尝艰苦，出万死而遇一生，所以见草创之难也。魏徵与我安天下，虑生骄逸之端，必践危亡之地，所以见守成之难也。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，守成之难者，当思与公等慎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十年公元六三六年。太宗向身边的大臣们问道：“帝王们的统一大业，草创与守成相比，哪一件更艰难些呢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：“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各路英雄竞相起兵，被攻破的才能降服他，被打败的才能制伏他。从这说来，创业最艰难。”魏徵回答说：“帝王兴起的时期，必定相承于世道丧乱衰败的时机。推翻那种黑暗奸诈的统治，百姓会真心实意地给以拥戴，四海之内各种力量也会归向于圣明。上天授命，百姓奉与，故创业不算艰难。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，志趣趋向骄奢淫逸。百姓希望有个喘息机会来休养生息，而兵役徭役却无时休止；百姓凋零残破生计无着，而帝王对奢侈淫逸的追求却不会收敛国家的衰落破败，常常由这里产生。以此而论，保持已经建立的功业就艰难。”太宗说：“房玄龄早年就跟随我打天下，东征西讨，备尝艰辛，且万死而遇一生，所以他了解草创基业的艰难。魏徵和我一起安定天下，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萌芽，必定重蹈危亡的境地，所以看到的是保持已建立的功业的艰难。现在，基业草创的艰难已经过去了；守成的艰难之处，我将与诸位大臣谨慎从事！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十一年，特进魏徵上疏曰：

臣观自古受图膺运，继体守文，控御英雄，南面临下，皆欲配厚德于天地，齐高明于日月，本支百世，传祚无穷。然而克终者鲜，败亡相继，其故何哉？所以求之，失其道也。殷鉴不远，可得而言。

昔在有隋，统一寰宇，甲兵强锐，三十余年，风行万里，威动殊俗，一旦举而弃之，尽为他人之有。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，不欲社稷之长久，故行桀虐，以就灭亡哉？恃其富强，不虞后患。驱天下以从欲，罄万物而自奉，采域中之子女，求远方之奇异。宫苑是饰，台榭是崇，徭役无时，干戈不戢。外示严重，内多险忌，谗邪者必受其福，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，君臣道隔，民不堪命，率土分崩。遂以四海之尊，殒于匹夫之手，子孙殄绝，为天下笑，可不痛哉！

圣哲乘机，拯其危溺，八柱倾而复正，四维弛而更张。远肃迩安，不逾于期月；胜残去杀，无待于百年。今宫观台榭，尽居之矣；奇珍异物，尽收之矣；姬姜淑媛，尽侍于侧矣；四海九州，尽为臣妾矣。若能鉴彼之所以失，念我之所以得，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，

焚鹿台之宝衣，毁阿房之广殿，惧危亡于峻宇，思安处于卑宫，则神化潜通，无为而治，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毁，即仍其旧，除其不急，损之又损，杂茅茨于桂栋，参玉砌以土阶，悦以使人，不竭其力，常念居之者逸，作之者劳，亿兆悦以予来，群生仰而遂性，德之次也。若惟圣罔念，不慎厥终，忘締构之艰难，谓天命之可恃，忽采椽之恭俭，追雕墙之靡丽，因其基以广之，增其旧而饰之，触类而长，不知止足，人不见德，而劳役是闻，斯为下矣。譬之负薪救火，扬汤止沸，以暴易乱，与乱同道，莫可测也，后嗣何观！夫事无可观则人怨，人怨则神怒，神怒则灾害必生，灾害既生，则祸乱必作，祸乱既作，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。顺天革命之后，将隆七百之祚，貽厥子孙，传之万叶，难得易失，可不念哉！

【译文】

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。位在特进的魏徵给皇帝上书说：

“我看，自古以来，得到河图而承受天运，承继国家大业，坚持礼乐制度，维护国家法令条文，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，高坐在宝座上统治万民，谁都希望自己的德行能与天地同厚，自己的光荣能与日月争辉，皇家的大位能百代相传，以至于万世无穷。然而，能善终的人却很少，失败和灭亡的却一个接着一个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，在于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。前代崩亡的镜子离我们并不远，这里可以作一点说明。

当初，隋家统一了天下，兵强士勇，三十余年之间，令行刀里，威震海外，却于一个早晨全都拿来抛弃了，尽为他人所有。那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得到治理而百姓安宁，不希望国家长久，故意要推行夏桀的暴政来造成自己的灭亡吗？他是依仗着国家的富强，不考虑后患啊！他驱使天下服从自己的贪欲，耗尽万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，搜求天下美女，征集异域珍奇；宫室苑囿装饰华丽，楼台亭榭构筑峻伟，征发徭役没有时限，用兵打仗没有休止。外表显得威严持重，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，奸谄邪辟之人必受其福，忠正耿直之臣不保其身；上下相蒙骗，君臣不同心。百姓不堪于役使压榨，全国都陷于离析分崩。于是作为一个全国尊崇的皇帝，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，子孙灭绝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能不痛心吗？

我大唐天子英明圣哲，当机立断，拯救天下于危乱倾覆之中，撑天的八柱倾倒了，能重新扶正过来；系地的四维废绝了，又再次设置起来。远方的人前来朝拜，近处的人安居乐业，国家达到治平没有超过一年；战胜残暴，消除杀戮，也不须要百年。而今隋人的宫殿楼台，全都被皇家住上了；奇珍异宝，也全都没收过来了；美

貌的嫔妃，都侍奉于您的身边了；举国之内，都是君王的臣了与奴婢，如果能借鉴于隋朝失败的教训，常常想想自己是怎样取得天下的，因而一天比一天谨慎，虽有美德而不自恃。下决心焚毁掉商纣王的鹿台宝衣，拆除掉秦始皇的阿房宫殿；畏惧着高楼广宇、雕墙画壁将葬送政权，从而安心于卑宫小殿，那么，自身的精神修养就能对百姓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。思想也就暗暗与百姓相通，从而达到无为而治，这是以德治国的最好办法。如果认为已成之功、已造之物不必毁弃，那就保存原有的这些宫室珍宝之类，去掉其中的不急之务，把耗费压缩了再压缩；简陋房屋与华丽宫室相间杂，玉石栏杆与泥土台阶相参和也不计较，百姓高兴的事就派他们去做，而且不要耗竭他们的精力。常常想想自己住在里面所享受的快乐，再想想建造它的人所付出的辛劳。使亿万百姓像为父亲效力一样愉快地来听从使唤，所有的人都仰仗国君而性情归于纯朴，这是以德治国的次等方法。如果君王有一念之差，不善始慎终，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，自以为有天命可以依恃，忽视保持采椽不斫的恭俭之德，追求画棟雕梁的绮丽奢豪，去拓展秦宫隋殿的基地进而增饰它，又随事添加，不知止足，百姓看不到君王的美德，相反只听到不断征发劳役的消息，这是最下等的治国方法。这种办法就像背着木柴去救火，扬起沸水来制止沸腾，用暴乱去代替暴乱，这就与昏乱者走上了同一条道路，后果是不堪预测的。后世子孙又从哪里找到自己的榜样呢？君主没有可以显示德行的业绩，就会使百姓怨恨、神灵发怒。百姓怨恨、神灵发怒，灾难和祸害就一定会产生，灾害一旦发生，则祸乱发作，祸乱发作而能保身全名的人就极少极少啦！皇上您顺从天意，革除隋氏而创业以后，将不断发展如同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不朽基业，并遗留给子孙，使它传到万代。国家的基业难于取得却容易丧失，能不认真思考吗？

【原文】

是月，徵又上疏曰：
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理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！人君当神器之重，居域中之大，将崇极天之峻，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者也。

凡百元首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忧而道著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

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，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？昔取之而有余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忧，必竭诚以待下；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，震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，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，奔车朽索，其可忽乎！

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弘兹九德，简能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，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，君臣无事，可以尽豫游之乐，可以养松、乔之寿，鸣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下司职，役聪明之耳目，亏无为之大道哉！

【译文】

在同一个月中，魏徵又上书说：

“我听说，希望树木长得茂盛的，必定要使树根牢固；要想河水流得远的，一定要深挖它的源头；要想国家政局安定，一定要多积道德、仁义。源头不深而望它能够长流，树根不固而望它茂盛生长，德义不积而望国家治理，我臣子虽然愚笨，也知道是不行的，何况英明圣哲的皇上呢！国君担负着国家重任，居于全国举足轻重的高位，要想秉承上天的大德，永久地保持无边的福禄，而不考虑安乐时想到危险，不想着以俭去奢，德行不能积于高厚，感情不能胜过私欲，这好比是砍掉树根来求得树木的茂盛，堵塞源头来谋求水流的长远！

“古来的许多君主，接受天命登上了皇位，没有不是在忧患中显现其圣明的德性，而一旦功成业就，就一步步德衰行败了。开始时好的确实很多，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很少。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？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，如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，处于沉重的忧患之中的，一定是竭诚尽心地接人待物；得志之后，就纵情傲物蔑视一切了。竭诚待人，即使胡人与越人也会连为一体；傲视别人的时候，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，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，用威风与愤怒去震慑，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，内心里不怀好意，表面上恭恭敬敬，但内心却不服气。怨恨不在大小，可怕的在于人心。水能浮船，也能翻船的比喻，是应该牢牢记取引以

为深戒的。统治天下，就如同手执朽索而驾驭奔马一样，是绝对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的！

“君临于万民的人，真该做到以下的“十思”：见到可以占有的东西时就想该用‘知足’来告诫自己；将要大兴土木而役使百姓时，就要想到适可而止，使百姓得到安定；知道居高则危就想应该保持谦和冲淡来自我约束；畏惧自满遭损时，就要想到大江大海容纳百川的度量；乐于游猎就想事不过三的明确限度；担忧自己松散懈惰时，就时刻想着办事必须慎始慎终；要防止壅塞蒙蔽就想应该虚心听取臣下的谏诤；想到谗言的危害性时，就应思考端正自身，斥退邪恶；恩泽所加就想不能因个人所爱而任意乱赏；将要处罚时，就要想想是否因一时恼怒而滥罚。汇总上述这十个应该想到的方面，发扬光大《尚书》中关于九种德行的倡导，挑选有能力的人才来任用他，择取正确的意见来实行它，那么，有智慧的人就能竭尽他的智谋，有勇力的人就会竭尽他的力量，仁德的人就会努力宣传他的仁慈，诚实的人就会以忠心报效国家。武将文臣争着为国家奔走效力，君臣上下都能相安无事，这就可以享受豫逸游玩的真正快乐，就可以保养赤松子、王乔般的仙寿高龄，像虞舜那样弹起五弦琴，唱起《南风》歌，垂衣拱手，不说教就使民风淳化。何必再去劳费精神，冥思苦想，代替下属去处理事务，来奴役自己那既聪又明的耳目，从而亏损‘圣人无为’的治国大道呢？”

【原文】

太宗手诏答曰：

省频抗表，诚极忠款，言穷切至。披览忘倦，每达宵分。非公体国情深，启沃义重，岂能示以良图，匡其不及！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，务在骄奢，不复留心治政。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：“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，但说平生常语，此非贻厥子孙者，尔身犹可以免，”指诸孙曰：“此等必遇乱死。”及孙绥，果为淫刑所戮。前史美之，以为明于先见。朕意不然，谓曾之不忠，其罪大矣。夫为人臣，当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所以共为治也。曾位极台司，名器崇重，当直辞正谏，论道佐时。今乃退有后言，进无廷诤，以为明智，不亦谬乎！危而不持，焉用彼相？公之所陈，朕闻过矣。当置之几案，事等弦、韦。必望收彼桑榆，期之岁暮，不使康哉良哉，独美于往日，若鱼若水，遂爽于当今。迟复嘉谋，犯而无隐。朕将虚襟静志，敬仁德音。

【译文】

太宗看了这两次上书，亲自写了回信说：“认真地看了您几次直言上书，的确尽了您对国家的忠诚恳切之心，话都说得透彻而中肯。我翻阅时竟然忘记了疲倦，常常直到深夜。不是你关心国家的感情深厚，重大义而开导我，怎能将这些治国良策写出来给我看，补救我的不足呢？我听说过，晋武帝从平定孙吴统一中国之后，就一心追求骄纵奢侈，不再留心于治理政事。他的大臣何曾从朝会上回家之后，对自己的儿子何劭说：‘我每次上朝见主上，他都不商讨治国的长远之策，只是说些平常话，这不是能把江山遗留给子孙的人，你还可以免除杀身之祸。’说到这里，便指着身边的孙子们说：‘他们这一代人，肯定会遇上国破家亡的丧乱而死掉！’后来到了他孙子何绥时，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滥用刑法杀死。前人写的史书赞美何曾，认为他有先见之明。我看不是这样，我认为何曾不忠于他的国君，罪恶是很大的。对于做臣子的人来说，就应该进则考虑如何尽忠，退则考虑如何补过，推广发展君王好的方面，匡正救助君王错误的方面，这才是君臣一体共治天下的道理。何曾官位高至丞相，地位高而名望重，应该直言不讳、严正劝谏，论述治国的正道来辅佐时政。如今退朝后才发出那番议论，进而无一句谏诤，若认为这叫明智，不是十分荒谬的吗？主人遇到危险了，却不肯扶助；眼看要倾倒了，却不肯挽救；那又要助手干什么呢？你所陈述的意见，使我知道了自己的过失。我将放它在几案上，就像西门豹身佩软皮、董安于佩戴强弓那样，随时警戒自己。肯定可以期望收效于我的晚年。我不会让那‘大臣们真好啊，一切政事都办得有条有理’的颂歌，只歌唱于尧舜时代；我不会让‘君臣投合，如鱼得水’的赞誉，竟不能再现于当今。回答你的善言虽然迟缓，但希望你仍然不怕冒犯，毫不隐晦地直言得失。我将虚怀若谷，安定心志，恭敬地等待着你的善言。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十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守天下难易？”侍中魏徵对曰：“甚难。”太宗曰：“任贤能，受谏诤，即可。何谓为难？”徵曰：“观自古帝王，在于忧危之间，则任贤受谏。及至安乐，必怀宽怠，言事者惟令兢惧，日陵月替，以至危亡。圣人所以居安思危，正为此也。安而能惧，岂不为难？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。太宗对待臣们说：“守天下到底是难呢还是不难呢？”身任侍中的魏徵回答说：“太艰难了。”太宗说：“任用贤能的人，采纳臣下的意见，就可以了，怎么说很难呢？”魏徵说：“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，当他们处于忧虑危急的时候，就能任用贤能而接受谏诤；及至安乐之后，一定心怀懈怠，放松自己。谁向他进言就必定弄得对方胆战心惊，惶恐惧怕，这样一天比一天衰退疲软下来，因此走到危亡的境地。圣人所以能居安思危，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安居时能怀畏惧之心，难道不算难吗？”

政体

【原文】

贞观初，太宗谓萧瑀曰：“朕少好弓矢，自谓能尽其妙。近得良弓十数，以示弓工。乃曰：‘皆非良材也。’朕问其故，工曰：‘木心不正，则脉理皆邪，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，非良弓也。’朕始悟焉。朕以弧矢定四方，用弓多矣，而犹不得其理。况朕有天下之日浅，得为理之意，固未及于弓，弓犹失之，而况于理乎？”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，更宿中书内省，每召见，皆赐坐与语，询访外事，务知百姓利害、政教得失焉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初年。太宗对萧瑀说：“我自幼爱好弓箭，自认为能完全掌握它的妙处。最近得到十多付好弓箭，拿去让弓匠鉴别鉴别，匠人说：‘不是好材料。’我问这其中的原故。匠人说：‘木料中心不正，就使木纹歪斜，弓虽然强劲有力，但射出的箭不直，所以不是好弓。’我这才明白了。皇帝我是凭着弓箭打出这个天下来的，用过的弓不算少了，却仍然不懂得良弓的原理。何况我拥有天下的日子还很短，所懂得治国之道，本来就不及对弓的了解。对弓尚且判断错了，何况对国家的治理呢？”此后，太宗诏令五品以上京官，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，每次召见他们，都赐给坐位，与他们一起谈话，询问外面的事，务必知道民间疾苦和政治教化的得失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元年，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中书所出诏敕，颇有意见不同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。元置中书、门下，本拟相防过误。人之意见，每或不同，有所是非，本为公事。或有护己之短，忌闻其失，有是有非，衔以为怨。或有苟避私隙，相惜颜面，知非政事，遂即施行。难违一官之小情，顿为万人之大弊。此实亡国之政，卿辈特须在意防也。隋日内外庶官，政以依违，而致祸乱，人多不能深思此理。当时皆谓祸不及身，面从背言，不以为患。后至大乱一起，家国俱丧，虽有脱身之人，纵不遭刑戮，皆辛苦仅免，甚为时论所贬黜。卿等特须灭私徇公，坚守直道，庶事相启沃，勿上下雷同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元年。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：“中书省签发的诏令制牒之类，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或许包含一些错误因素，那就该用否定的态度去纠正它。原先设置中书省、门下省，本来是互相防止过失错误。人们的意见，常有不同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，本意都为国家大事。然而，有的人替自己护短，忌讳听到批评其过失的意见，或是或非，都记恨于心而结下怨仇；有的人无原则地回避私人嫌隙，相互照顾脸面，明知不合政事要求，居然也就签发施行了。不敢违背一个长官的小小情面，却顷刻间成为万人的大害。这实在是使国家危亡的做法，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止。隋朝时，里里外外的众官，处理事情总是模棱两可，因而遭致祸乱，很多人不能深刻思考这个道理。当时大家都以为祸害不至于危及自己，当面附和服从而背后却随便议论，谁都不认为这是祸患的根子。后来闹到天下大乱，公室私门一起破败，虽有个别人侥幸脱身，纵然没有遭受刑杀之祸，也都历尽惊惶流离之苦而仅得勉强活下来，很被人们所耻笑。你们必须灭除私心，一心奉公，坚守正道，处理各种事情时互助启发，不要上下一个腔调！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近代君臣治国，多劣于前古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古之帝王为政，皆志尚清静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，所任用大臣，复非经术之士。汉家宰相，无不精通一经，朝廷若有疑事，皆引经决定，由是人识礼教，治致太平。近代重武轻儒，或参以法律，儒行既亏，淳风大坏。”太宗深然其言。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，兼识政体者，多进其阶品，累加迁擢焉。

【译文】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问王珪说：“近代的君臣治理国家多比上古的君臣拙劣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”王珪回答说：“上古的帝王治国，志趣崇尚清静无为，他们想百姓之所想。近代帝王则只知道损耗百姓来满足私欲，所任用的大臣，又根本不是那种懂得以仁义治国的经术之士。汉代的宰相们，没有一个不是精通一本经书的人；朝廷若有难以决策的问题，就都引用经典来作出决定。由于这样，人们多懂礼义规范，国家的治理就达到了太平。近代重视武备而轻视儒术，或者参用法令刑律，儒家的道德规范已经遭到损害，淳朴敦厚的民风受到很大破坏。”太宗十分同意他的这一席话。从此以后，百官中有学业优良，并懂得治国原则的人，一般都能升其爵级，一次次地受到提拔重用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三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中书、门下，机要之司，擢才而居，委任实重。诏敕如有不稳便，皆须执论。比来惟觉阿旨顺情，唯唯苟过，遂无一言谏诤者，岂是道理？若惟署诏敕、行文书而已，人谁不堪？何烦简择。以相委付？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，必须执言，无得妄有畏惧，知而寝默。”

【译文】

贞观三年。太宗对身边的侍从供奉之臣说：“中书省与门下省，是朝廷的机要部门。国家提拔人才居于其位，所给予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。皇帝颁发的命令如有不稳妥、不便施行的，都必须坚持己见。近来只觉阿谀奉承，顺从上情，唯唯诺诺地草率通过诏令文告，没有一句直言劝谏的话。这难道是治国的道理么？如果只是在诏令上签个字，搞点抄转收发的活计，那谁不能干呢？又何必反复慎重地挑选人才，委以重任呢？从今以后，对皇帝颁发的命令有认为不稳妥、不便施行的，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得妄自畏惧，明知不对也保持沉默。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四年，太宗问萧瑀曰：“隋文帝何如主也？”对曰：“克己复礼，勤劳思政，每一坐朝，或至日昃，五品已上，引坐论事，宿卫之士，传餐而食，虽性非仁明，亦是励精之主。”太宗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。夫心暗则照有不通，至察